

法德關係之最近演變

陳澤豐

西德與蘇俄互不使用武力條約的簽訂，帶給西方盟國一個直接而顯著的影響，可能即是法、德關係的疏遠。法德兩國過去在戴高樂時代，曾維持着「蜜月」式的合作關係，可惜好景不常，隨着戴高樂的歸隱與布蘭德的上台，法德關係似乎也在醞釀新的變化。

德俄簽約，為歐洲開拓一個新紀元，那是衆所公認的事實；同時，它或許也象徵法德合作關係的告終，這僅是個人大胆的揣測。法德合作已逾七載，為何突然有此戲劇性的變化？歸根結底，主要是布蘭德所採行的「東向政策」與法國的利害衝突，引起法國的不安與嫉妒所致。

一 法德合作關係的回顧

法國第五共和與西德的合作的開端，可以追溯到一九五八年九月十四日，戴高樂和前西德總理艾德諾（Konrad Adenauer）在哥隆貝（Colombey-les-deux-Eglises）私邸的會晤。儘管他們兩人的出身、性格、理想與

作風迥然不同，但由於相互仰慕、敬重而建立私人的堅固友誼，從而達成一項雖未形諸文字，但却彼此心照不宣的君子協定，即西德贊助法國實現其「偉大法蘭西」的理想，法國則支持西德向東發展的立場。（註一）

戴高樂與艾德諾之間的水乳交融私誼，無疑的奠定了日後法德兩國合作的基礎。一九六二年七月，當艾德諾首次訪問艾麗榭宮（法國總統府）時，戴高樂曾步下宮前石級相迎，這是戴高樂接待其他國家元首罕有的例子，可見艾氏所享禮遇之隆。同年九月，戴高樂的答訪西德，意味着他與艾德諾的交情私誼已登峯造極，也顯示法德合作的時機已告成熟。當戴高樂結束訪問，返回巴黎後，法國政府即照會波昂當局，提出有關雙方外交、國防、文化等方的合作方式與磋商的程序，波昂反應積極，因而有一九六三年一月法德條約之簽定。至是雙方之合作水到渠成。

德法合作條約簽訂以來，已邁進第八個年頭。該約規定，兩國政府領袖每隔六個月在雙方首府輪流舉行一次高階層會談，磋商雙方合作諸問題並交

換對世局之意見。七年來，該項條約對於促進法德經濟合作與文化交流，貢獻頗多，而兩國定期保持接觸，遇事磋商，隨時交換意見，充分表現協調與合作的精神，這似乎正是條約的主要立意所在。

德法合作條約訂立不久，不幸艾德諾隨即卸任。由於繼任者的聲望不能與戴高樂相頡頏，很自然的造成戴高樂予智自雄，獨斷專行的局面。波昂為保持其與巴黎間的和睦關係，常須處處顧慮法國的立場，牽就戴高樂的主張。至此，所謂法德合作也者，無異乎以法國為主，德國為副的一種主從關係。以日爾曼民族的優越感與自尊心之強，真是孰可忍，孰不可忍！對西德而言，這種帶有屈辱性的處境，總算在去年夏秋之間，因兩國高層政治領袖的更迭而有所改變；以布蘭德抗衡龐畢度，再加上法德兩國勢力的消長，預料今後雙方的會談，至少是個平分秋色之局。

二 法國與「東向政策」的離合

「東向政策」的原始創議人戴高樂，一心追求法蘭西的光榮與偉大，利用法國的特殊地理位置，在國際政治舞台縱橫捭闔，一方面標榜獨立自主的外交，退出北約軍事組織，杯葛美國，一方面揭露所謂「和解、協調、合作的政策」（La politique de détent, d'entente et de coopération），拉攏蘇俄，與東歐國家秋波頻送，儼然以東西方的調人自居。

自龐畢度繼任法國總統後，雖然宣稱依循戴高樂的政策，繼續與蘇俄接近，但蘇俄對於戴高樂不在其位的戴高樂政策，並不感興趣。相反的，蘇俄選擇新上任而銳意東進的布蘭德為其談判對象，西德自此取代法國的地位，成為蘇俄在西歐的特別伙伴，這對戴高樂繼承人的自尊心的打擊自然不小。基於歷史的關係與地理的因素，歐洲盟國，尤其是法國，關心波昂新聞的動向，本是常情。就一般常識判斷，法國支持西德的「東向政策」，樂見德俄修好，似乎也是順理成章之事，因為正如龐畢度所說：「那正是法國幾年來所追求的相同政策。」

行記者招待會中強調說：「布蘭德的接近東歐政策，合乎歐洲一般的利益，也符合西歐與東歐，乃至全歐洲的利益。」（註二）緊接着，龐畢度於波昂會談時表示：「西德政府與東方國家正常化關係的意願，法國予以精神和政治上的支持」，他並向布蘭德保證說：「法國支持您與東方國家接洽的偉大企業，並對您的勇氣與現實的看法深表敬佩。此一企業乃歐洲未來的主體。」

（註三）同時，法國外長舒曼（Maurice Schumann）也一再重複戴高樂與龐畢度以前所作的有關贊成「東向政策」的宣言。據舒曼說，這些宣言構成巴黎與波昂之間「一種事先建立的和諧。」（註四）

一旦聞悉德俄新約之簽訂，正在海濱別墅渡假的龐畢度，向法新社記者宣佈說：「忠於樂見歐洲所有國家間之和解、協調與合作的政策，法國為西德與蘇俄之協定慶賀。這是一項不斷鼓勵而締結的條約，它構成了建立歐洲真正安全的一個重要支柱。」（註五）另一方面，法國政府也發表聲明說：「法國政府祝賀德俄條約的簽定。此一事件在東西歐國家的合作關係與和解的路途上，構成一個重要的步驟。」（註六）

龐畢度個人與法國政府所作的冠冕堂皇表示，是否便意味着法國對「東向政策」的全心全意支持呢？其間是否仍有保留或可存疑之處呢？這是一個很微妙的問題。事實上，沒有一個國家，沒有一個元首願意背上「破壞東西和解」的罪名，準此，外交辭令的可信度便可想而知了。

當記者問及布蘭德所提舉行歐洲高階層會議的建議時，龐畢度避重就輕的表示說：「見面總是好的，然而總該有點東西可以談的。目前，我看不出有促使我們見面的特別理由。」（註七）從龐畢度含蓄而婉轉的拒絕參加歐洲高階層會議一事看來，多少可以窺知法國對德俄修好的本意以及法德關係的未來發展。

三 法國的真正顧慮所在

法國眼見西德進行「東向政策」順利，不免摻雜有失望、不滿、疑懼與嫉妒等複雜而微妙的情感。分析其原因，可歸納為幾點：

（一）法國不願東西德之統一——鑑於普魯士統一與兩次世界大戰帶給法國的慘痛教訓，現在的法國當然不希望在其近鄰有一個強大而統一的德國出

現，而波昂「東向」的終極目標，似乎是法國所引以為懼的結果。這一點，龐畢度本人也坦白承認，他說：「國家像每一個人一樣，我們比較喜歡一個不太強大的鄰國。」（註八）正如巴黎「快訊」（L'Express）週刊所指出，西歐經濟第一強國——西德，加上東歐第二經濟強國——東德，若有一天他們又懷抱征服歐洲，使之日爾曼化的幻想，那是首當其衝的法國不能不引起憂慮的。（註九）

（二）法國不願德俄修好——一個強大而統一的德國如果走錯了政策路線，則可能帶給歐洲無比的災難與苦痛；假使德俄聯合一起，互通聲氣，則其對歐洲和平與安全的威脅，自更可怕，這也許是巴黎當局為之憂慮而力求避免的。

（三）法國不願西德取代它在歐洲的地位——西德的强大，不僅將取代法國在歐洲原有的發言地位，且因德俄條約的締結，西德成為蘇俄在歐洲的「特權伙伴」，使法國無法再扮演「東西調人」的角色。

（四）法德在東歐經濟利益的衝突——由於「東向政策」的成功，西德可能取代法國在蘇俄及其他東歐國家的經濟利益。據統計，自一九六五年至一九七〇年五年期間，西德與蘇俄或其他東歐國家，甚至包括對匪共的貿易額，已遠超過法國。（註十）

（五）對龐畢度個人聲望的挑戰——自戴高樂於去年四月去位之後，歐洲的重心顯已轉移至西德。當龐畢度於去年年底參加海牙六國高層會議之時，已發現西德不再是一個「政治上的侏儒」。尤其是英國之可能參加歐洲共同市場一節，得力於西德者最多，以致西德領袖在歐洲之發言地位亦相對增加。如果經由西德之努力，果真導致歐洲和平之到來，則不僅布蘭德個人在國內之政治地位大增，即其國際聲望亦將大為提高，這是龐畢度所難能忘懷者。

四 法德關係展望

法德協定的達成，證明了由波昂到莫斯科之路，並不一定要折經巴黎。法德和睦關係，只有在西德唯法國馬首是瞻的情況下始可維持。現在，西德已一躍而為西歐第一強國，豈肯再居人下，在如此形勢下，法國願否與之衷

照舊預算開支。不過政府已有可以略加修正即可通過的把握，而所採的策略，為凡投票贊成的執政黨議員，即可望撥付一百萬銖作為其地方建設經費（註十八）。果然如此，則適為共匪統戰增加聲勢。因為由反對政府而轉為支持即有利可圖，誰不願意先唱反調。這正是給共匪統戰利用的空隙。

八 結論

泰國是東南亞地區反共最堅定的國家。由於他儂政府阻外敵于國境以外的戰略，配合以繁榮達成安定的政略，已使此一中南半島心臟地區成為阻禦共匪南侵的長城。如果美國對泰的援助，既使其無法於國境以外阻遏外敵，又不能繼續有足够的經建資金，則他儂政府的政略戰略勢必被迫放棄，兩面外交政策，難保不在乃比里所執行的共匪統戰計劃下，重見于此一國土上三百年未發生過流血戰爭的國家。

大家決不可認為泰國與共匪發生關係，祇不過是姿態而已。據八月七日法新社曼谷電：泰國國會議員要求他儂總理，證實政府代表在永珍與共匪談判貿易的消息，他儂總理不承認亦不否認。以政治價格購買泰國滯銷的農產品，正是共匪配合統戰的另一戰線，誰能保證這項談判不是事實？協助泰國解決經濟貿易問題，尊重此一盟邦為東南亞阻遏共匪南侵所作的犧牲，在言論方面多予以精神上的支持，才能擊敗共匪的對泰統戰。如美國鴻派對泰國所作的狂言謬論，日本財團對泰國的投資遲疑不前，無異使共匪的對泰統戰，除經由巴黎的乃比里而外，更可得到多方面的策應。

註(一)(五)(七)(十)・見八月廿四日香港時報駐泰記者乃汝良「泰國政壇暗

潮洶湧」的報導

註(二)・見泰國憲法第六章及第七章

註(三)・見八月七日香港星島日報

註(四)・見八月八日路透社曼谷電

註(六)・一九六九年二月十四大選，執政黨當選議員七十六人，另有無黨派議員三十五人投入執政黨，湊成一百十一人，佔衆院全部議席二百十九席的多數

註(八)(九)・見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十二日及十月十六日曼谷世界日報

註(十一)・見去年三月七日星島日報所載合衆社曼谷六日電

上接第31頁

心合作，誠屬疑問。德法若自此互相猜忌，在雙方合作關係上蒙上一層陰影，誠非西歐團結之幸！

法德關係若日漸疏遠，可能產生兩種副作用。(一)法國有鑑於歐洲均勢的失去，將重蹈過去傳統外交的覆轍，與英國攜手合作，預料法國將不為難英國入會，以共同市場的雄厚力量來抵制西德與東歐的貿易。(二)法國在遭受莫斯科的冷落後，勢必另闢蹊徑，加強拉攏中共。預料十月初龐畢度的訪俄，除可能加強雙方的經濟合作關係外，勢難改變德俄法三角間的現存關係。法國雖失意於歐洲，但並不甘寂寞，遂轉而尋求向北京的發展，法國領土計劃部長畢丹古(André Bettencourt)之重遊匪區大陸，與周匪恩來之可能訪問巴黎，便是此一形勢的產物。據「新觀察家」(Le Nouvel Observateur)週刊透露，龐畢度甚至有親自訪問北平的意圖。(註十一)

(註十一) Alfred Grosser, *La Politique Extérieure de la Ve Ré-*

publique, P. 85

(註十二) Le Monde, 4/7/1970

(註十三) Le Monde, 7/7/1970

(註十四) Ibid

(註十五) Le Monde, 9~10/8/1970

(註十六) Ibid

(註十七) Le Monde, 13/8/1970

(註十八) Le Monde, 4/7/1970

(註十九) L'Express, N°985, 25~31 mai 1970

(註二十) Le Monde, 8/8/1970

(註二十一) Le Nouvel Observateur, N°304, 7~13 Sep. 1970

註(十一)・參見程浩著「東南亞列國志」
註(十二)(十四)(十五)・請參閱本刊五卷十一期抽著「不可忽視的泰國危機」
註(十七)・請參閱本刊八卷十期抽著「泰國面臨的兩大難題」

註(十八)・見八月十日曼谷世界日報
註(十九)・見朱鶴賓著「東南亞新興國家」一書
註(二十)・請參閱本刊八卷十期抽著「泰國面臨的兩大難題」